

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界定與 語藝選擇^{*}

林靜伶^{**}

摘要

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在動員上展現瞬間匯聚人潮的效力，但也面對人潮瞬間消逝的考驗。如何界定社運行動者與如何針對網路行動者特性採取適當的語藝策略，成為網路時代社會運動的新考驗。本文從相關理論文獻與個案的對話，提出網路時代四圈社會運動行動者的圖像，以第一圈為承諾度最高的內圈，向外圈擴散。其中第四圈尤其反映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自主性、個體性、隱匿、旁觀等特性。本文進一步建議與四圈行動者對應的語藝選擇與媒介使用。

關鍵詞：社運行動者、社運說服功能、社會運動語藝、語藝選擇、網路時代

* 本文作者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的寶貴意見以及靜宜大學王孝勇副教授努力催生此次語藝專題。

** 林靜伶為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Email: maco1001@mails.fju.edu.tw。
投稿日期：2014/8/19；通過日期：2014/10/11

壹、問題意識

當代一種參與公共政治的行動大致源於 1750 年之後的西方國家，這種行動在 19 世紀之初的西歐和北美被廣泛察覺，並大約在 19 世紀中期被稱之為社會運動。20 世紀以來，大眾媒介對社會運動的報導，擴大了社會運動的訴求範圍（Tilly & Wood, 2009）。然而，社運和媒體之間存在不對等的關係，以致社運行動者不得不依賴媒體卻又很難只依賴媒體，也無法控制媒體對社運的呈現方式。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社會運動發聲有新的可能性。1995 年美國建立公共使用的網際網路，1996 年網際網路便已成為世界普遍的語彙。1990 年代後期所開發的行動通訊設備逐漸普遍。具有傳送簡訊、影音、與聯網功能的行動通訊設備加上網際網路的空間，在 21 世紀成為抗爭活動的工具和平台。社運行動者在網路空間擁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運用網路傳達社運訴求。在大約十多年的時間，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便已經成為新興的社會運動景象，也成為學者們關注與考察的焦點。

如果 20 世紀的大眾媒介帶給社運的挑戰是社運訴求的能見度和忠實度，那麼 21 世紀的網際網路帶給社運什麼新的挑戰？從全球場景到在地場景，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展現各種樣貌。在台灣，我們也目睹網路時代社會運動驚人的動能。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社會運動面臨新的挑戰。以下從兩個相關的現象思考網路時代社會運動面對的挑戰。

一、來無影去無蹤的抗議人潮

創辦於 2004 年的臉書，在 2008 年開始有了中文版本。在台灣，以臉書號召群眾，並在台北就匯聚數 10 萬人走上街頭的抗議活動像是 2010 年 9 月 25 日白玫瑰運動（約 30 萬人），2013 年 8 月 3 日「萬人送仲丘」活動（約 25 萬人），2014 年 3 月 30 日太陽花運動（約 50 萬人）。這樣的抗議人潮恐怕連發起抗議活動的組織者都感到驚訝。但這三個運動抗議人潮瞬間匯聚，也瞬間散去。

太陽花運動 3 月 30 日在凱道上匯聚 50 萬人潮，當晚林飛帆在演說中呼籲在場者與周遭的人留下電話，此後排班到立法院持續抗爭。

結果第二天早上立法院議場內場外人數都大不如前。林飛帆在臉書上發文感歎：「欸，你們真的有來排班嗎？」^[1]。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抗議人潮是怎麼回事？這些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們該怎麼理解這些來無影去無蹤的社運行動者？

網路在行動動員所發揮的效率有目共睹，但我們不能誤以為臉書或網路科技本身便足以召喚這樣大規模的行動參與。在其他抗議案例中也使用臉書卻沒有前述三個運動的參與規模，例如 2012 年 9 月 1 日的反媒體壟斷抗議行動，規模估計約 6 千至 9 千人。又如 2013 年 3 月 9 日的反核大遊行，即便是在 2011 年日本的福島核災提升台灣民眾對核電安全的敏感意識，即便台灣反核運動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在台北的抗議人數約 10 萬人，也比不上前述三個瞬間匯聚的抗議人潮。這意味不是只靠網路社群媒體平台就足以召喚大規模的參與行動。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在召喚人們走上街頭？

二、憤怒的語藝與激情過後的無力

前述三個抗爭行動，除了瞬間匯聚眾多人潮外，其共通性還包括新聞成為觸發事件（triggering events）。白玫瑰運動起因於民眾不滿數起法院輕判性侵兒童案件，引發聯署與抗議活動；萬人送仲丘活動起於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在退伍前兩天死亡，媒體報導疑似遭凌虐，引發各界撻伐與抗議；太陽花運動起因於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 30 秒之速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起學生和公民抗議，進而占領立法院。這些事件經由媒體報導引發關注與各種情緒。在諸多情緒當中，憤怒成為燎原的星火，也成為社運團體藉以召喚行動的訴求。例如，2013 年「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起兩次走上街頭的抗議，7 月 20 日的公民教召，和 8 月 3 日的萬人送仲丘，聯盟在其網頁上的貼文，呈現這樣的憤怒召喚：

在這個充滿憤怒、失望、不公義的國家，在腐敗的國軍，以及顛覆的政府暴政橫行的情形下，各位的出現，證明了台灣公民社會的能量。（公民 1985 行動聯盟，2013.07.21）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將於 8/4 洪仲丘先生公祭之前，於 8/3 晚間六時假凱達格蘭大道舉辦萬人送行晚會。敬請所有關心此案發展的全體公民站出來，讓政府看見人民的憤怒與不滿，承諾以上三點訴求！如此才能使仲丘的犧牲，給這個社會留下更多制度面的改革，他的犧牲，才能保護更多服役的台灣青年不受迫害。（公民 1985 行動聯盟，2013.07.27）

Castells (2012: 13-15) 認為在個人的層次上，社會運動是「情緒的運動」(emotional movements)。社會運動成為暴發性的力量來自情緒轉化為行動。Castells 援引情感智能 (affective intelligence) 相關理論，指出「在認知一個不正義的行動以及辨識應為此負責的對象時，憤怒感隨之遞增」。當個人的憤怒與他人的憤怒連結與匯聚時，才有機會轉化成社會運動的力量。從情緒到行動需要的是有效的溝通平台。Castells 認為網路連結為社會運動提供新的平台。

我們可以同意網路平台特性所帶來的機會，像是迅速傳播情緒。但是，網路平台本身不會創造情緒。召喚情緒、召喚憤怒的終究是人。從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網路平台的文章和行動召喚來看，憤怒的語藝透過網路媒介散播，傳統媒介再製和傳送其憤怒號召，構成眾人憤怒的圖像，讓社會行動獲得正當性。

情緒的語藝（像是憤怒）成為瞬間召喚行動的力量。在一個現場的抗議活動中，情緒被帶到高點，也在行動中獲得宣洩。在後續的行動規劃中，只靠情緒的語藝，缺乏對社運目標的界定和論述，恐怕也就缺乏號召力。對社會運動推動者而言，激情過後，真正的挑戰才開始。如何理解這些瞬間匯聚的眾多「陌生人」？如何發展論述持續召喚人們的支持？這才是後續的考驗。

王維菁、馬綺韓與陳釗偉 (2013: 11-13) 的研究發現「對網路群眾缺乏瞭解、無法有效經營網路社群」與「網路動員效果無法累積」是台灣環保團體在運用網路推動社會運動所面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印證前述網路時代的社運行動者瞬間匯聚與瞬間散去、難以被掌握、難以被瞭解的特性。

於是，21 世紀的網際網路為社運帶來發聲自主性的機會時，也為社運帶來新的挑戰：如何重新認識網路時代的社運行動者？如何界定社運的目標對象、進而採取適當語藝策略？當我們在試圖理解和界定傳播的目標對象時，大多採取人口基本變項、社會經濟地位的區分、生活形態等，於是我們會注意年齡層、性別、學歷、職業、收入、城鄉、休閒娛樂、消費習慣等變項。網路時代的社運推動者在試圖瞭解其傳播／溝通對象時，除了從上述方向瞭解其目標對象，應該要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方式。本文主張從「行動者」角度界定社會運動目標對象，是一個比較貼近網路時代社會運動情境下對「人」的理解方式。同時，本研究採取語藝觀點考察社會運動現象，有別於過往社會學觀點強調結構因素的考察（王甫昌，2003；何明修、林秀幸，2011；張茂桂，1994），語藝觀點則凸顯了「人」和「語言符號」的角度。

在行動者角度和語藝觀點的基礎上，本研究探索兩個問題：（一）如何界定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行動者？（二）社會運動語藝如何回應網路時代的行動者特性？本文從相關文獻檢閱與個案資料的對話，試圖勾勒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行動者（以下簡稱社運行動者）與語藝選擇的圖像，希望這個圖像可作為實踐與觀察社會運動的參考。

貳、社運行動者的圖像

我們該如何理解社運行動者？尤其是如何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對社運行動者的理解該如何調整？以下的討論試圖從三個理論層面進行。首先從語藝學者對社會運動的外部閱聽眾與內部閱聽眾的討論出發，本文指出其不足以掌握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之處，接著導出對社會學者 John Wilson 對社會運動三圈行動者的描繪，本文提出增加第四圈行動者以及重新界定四圈行動者特性。最後，再彙整相關文獻中對於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的討論。

一、社會運動語藝的外部閱聽眾與內部閱聽眾

語藝學者在觀察社會運動語藝時，多會區分社運語藝對象及其對應的語藝策略。外部閱聽眾與內部閱聽眾是主要的區分方式。Morris &

Browne (2006) 編輯的 *Readings on the Rhetoric of Social Protest* 書中，便是將語藝學者們的研究以「針對外部閱聽眾的策略」(tactics for external audiences) 和「針對內部閱聽眾的策略」(tactics for internal audiences) 加以分類。

社會運動的出現與其所處的社會情境密切相關。社會運動不滿現狀、尋求改變，立即面對的語藝挑戰便是闡釋現狀有何問題、改變何以必須。所謂「外部閱聽眾」就是那些尚未察覺問題、不解改變何以必須的人，社運必須針對他們發展出適當的語藝策略。外部閱聽眾可能包括反對者、現狀維護者、一般公眾。而一般公眾則有許多可能性，像是對議題無知者、立場猶豫者、冷漠者。^[2] 社會運動語藝對於外部閱聽眾的判斷和選擇，也意味對情境的判斷。社會運動語藝需要時時回應情境、調整語藝策略，以獲得更大的支持力量。

社會運動語藝的「內部閱聽眾」大多指社會運動的成員、支持者、或同情者。大致而言，內部閱聽眾已經認同社會運動的主張，並會採取不同程度和性質的行動。^[3] 內部閱聽眾雖然同質性比外部閱聽眾高，但仍有差異。社會運動的內部閱聽眾包含自身權益關係人，像是同志運動的內部閱聽眾包含爭取自身權益的同志，或是勞工運動的內部閱聽眾應包含爭取自身權益的勞工。這類社會運動屬於「自我導向的社會運動」(self-directed social movements)。但是社運的內部閱聽眾不限於爭取自身權益的關係人，也可能包括其他支持者，像是成立於2004年的青年樂生聯盟協助因為捷運工程面臨拆遷的樂生療養院院民爭取權益。^[4] 這類為他人權益而發聲的社會運動屬於「他者導向的社會運動」(other-directed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語藝與內部外部閱聽眾的關係可從以下幾個重點來看。首先，將外部閱聽眾轉化為內部閱聽眾是社會運動語藝的持續任務。擴大內部閱聽眾意味擴大支持力量。因此將外部閱聽眾轉化為支持者是社運語藝必須持續的努力。然而，內部閱聽眾因其相近的理念而聚合，在共同理念和議題之下有其同質性。相較之下，外部閱聽眾的異質性高，對於社會運動的推動者而言，召喚外部閱聽眾的語藝挑戰在於找到差異中的共同基礎 (common grounds)，並據以連結社運主張。

第二，社會運動語藝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內部與外部閱聽眾應發展出不同的溝通方式，並要理解內部與外部閱聽眾經常是對社會運動不同的推拉力量。有時社會運動語藝滿足了外部閱聽眾的期望，卻犧牲了部分內部閱聽眾的認同。例如太陽花運動在占領立法院二十四天後退出立法院，以「出關播種」^[5]的語藝退出立法院或許符合社會期望（外部閱聽眾以及部分內部閱聽眾期望），但也引起部分內部閱聽眾的不滿，像是在立法院二樓守護的成員^[6]、以及立法院外的「賤民專區」成員^[7]。同時要面對外部閱聽眾與內部閱聽眾的期望是社會運動語藝的挑戰。

第三，社會運動語藝要維繫內部閱聽眾的持續的認同和動能。當社會運動的目標難以達成、需要長期抗戰時，社會運動語藝既要回應外在情境，也要維繫內部成員的認同、承諾和付出。在社運未能達成目標或社運目標策略需要調整時，需要在內部閱聽眾之間建立溝通方式以達成共識。

社會運動語藝區分外部閱聽眾與內部閱聽眾在實務操作上有助於針對不同對象選擇適當語藝策略，在研究上有助於對社運語藝進行評估。但在面對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現象，這樣的區分恐怕不足以掌握數位時代的行動者特性。本文接著討論 John Wilson 對社運行動者三圈的區分，進而提出本文的調整與增補第四圈。

二、社運行動者：從三圈到四圈

社會學者 John Wilson 描繪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可分為三圈。在中心的第一圈是一小群全時付出、有報酬的人，他們對社會運動的目標完全投入，並願意做出任何犧牲。第二圈的人是在行動時期全時投入，在行動遭遇困境時有高度的承諾和支援，但第二圈的人多數在平時無法完全投入，因為社運只是他們生活的一小部分。第三圈包括一些同情者和具有社會位階或知名度的人，他們既不完全是運動內部的人，也不完全是運動外部的人。他們不願被視為特定社運團體的成員，但在需要時會現身表示支持。這類行動者可能具有像是法官、政治人物、企業高層、意見領袖、演藝人員等（Wilson, 1969: 30, 轉引自 Stewart, Smith, & Denton, 2012: 76-77）。

Wilson 的區分在今天看來仍有參考價值，但需要一些調整和補充。以下是本文對 Wilson 的三圈社運行動者界定的重新調整，並加上第四圈行動者（見表 1）。

首先，第一圈的人是全時付出、全心投入、對組織／團體有高度承諾的人。在一些歷史久、具規模的社運組織中，會包括一些有薪資報酬的工作者，但也經常包括一些義工。這些都屬於第一圈的社運行動者。第二圈的人可以包括像是穩定的組織成員、認同組織理念者、持續捐款的人，他們平時無法經常性付出心力，但在組織行動動員時會投入。

第三圈的人關心某些議題，但未必直接加入特定社運組織、未必全然認同特定組織，在行動付出與持續關心程度上不如第二圈的行動者，但在特定議題下的召喚或動員獲得認同時，會願意現身或背書。一些社會知名人士或具有社會影響力者在必要時願意現身或背書，多屬於第三圈的行動者。以台灣的環保運動為例，有許多不同的組織或團體，第三圈的行動者持續關心環保議題，但未必對任何一個環保團體有持續的忠誠度。

本文在此建議第四圈的行動者，因為前述三圈的行動者尚不足以包括在單次行動中被召喚的人。所謂第四圈的行動者，亦即在特定議題或特定訴求的召喚下願意採取行動的人，像是參加抗議活動或是捐贈物資。這類人在過去缺乏或鮮少參與社運經驗、對特定議題未必有持續關注或行動，而是在特定訴求的行動召喚下採取行動。這種人或可被稱之為「社運素人」。

前述三圈的行動者是社會運動組織在行動動員時，大致可以預期或估算的現場參與人數。而第四圈的行動者則是社會運動組織無法掌

表 1：四圈社運行動者的區分

社運行動者	組織認同	時間付出	議題關注	行動參與
第一圈	高	全時	高	高
第二圈	高	必要時	高	高
第三圈	低	不定	高	不定
第四圈	低	不定	不定	不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握、難以瞭解、不可預估的行動者。他們來無影、去無蹤。他們是「匿名公民」。

本文對於這四圈社運行動者的區分建立在以下的預設基礎上。

- (一) 四圈行動者的區分是依據時間付出程度、組織參與／認同程度、議題關注程度、行動參與程度與參與方式。
- (二) 四圈行動者的區分是流動的、移入移出的。
- (三) 以第一圈為內圈，向外擴散，越是外圈的流動性越大。
- (四) 越是外圈的行動者，社運組織越難瞭解與掌握其意向。

前述社會運動語藝的內部閱聽眾可以界定為大致包括前述第一圈、第二圈至第三圈的行動者。外部閱聽眾則以第三圈至第四圈、及其以外的行動者為對象。第三圈行動者在內部閱聽眾和外部閱聽眾之間擺盪、流動。當第三圈行動者屬於猶疑的、投入程度低的、承諾程度不穩的行動者時，這類的第三圈行動者便可被視為趨向社運語藝的外部閱聽眾。

三、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

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面對的是不同於以往傳統大眾媒介時代的閱聽人。本文主張從「行動者」角度理解網路時代的社運參與者。從相關的理論文獻和實證觀察，可以彙整出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特性，包括個體性、自主性、隱匿、旁觀、能動性、反思性（學習）等，本文認為這些特性在第四圈行動者身上尤其顯著。

（一）個體性與自主性

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自主性藉由網路平台比過去更為彰顯。從Castells（2012）提出「大眾自我傳播」與「新社會運動文化」的主張，試圖捕捉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個體性與自主性。

Castells 認為近年來傳播環境的根本改變在於「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興起。所謂大眾自我傳播，是指使用網際網路和無線通訊作為數位溝通平台，它依舊具備大眾傳播特性，因為訊息傳播過程可以從眾人到眾人，訊息來自多元傳送者，可以觸

達多元的接收者。它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傳播，因為訊息的產製由傳送者自主決定，訊息的接收是自我導向（self-directed），訊息的取用與修改是自我選擇（self-selected）。大眾自我傳播建立在互動傳播的水平連結基礎上，難以被政府或組織控制。這種數位傳播的多元模式容許使用者近用全球的超連結文本，使用者可以根據個別需要重新混製（remix）超連結訊息（Castells, 2012: 6-7）。簡言之，網路媒介使用者在訊息接收與傳送、訊息產製與混製、訊息超連結上，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性。

Castells（2012: 230-232）進而主張網路時代產生新社會運動文化。他認為網際網路的角色不僅止於工具性（instrumentation）。它不只是為社會運動提供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一種分享實踐的形式，它為沒有領袖的社會運動提供生存、審議、協調、和擴張的發展條件。這種形態的社會運動可說是一種文化運動。它所紀錄的文化改變在於新價值的出現。這種新價值就是個體性（individuation）與自主性（autonomy）。

個體性不等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體性強調個人的規劃成為引導個人行為的重要原則。個人的規劃可能轉化為趨向群體行動和共享理念，進而形成社群。而個人主義則是僅以個人的利益為終極目標。

對 Castells 而言，自主性有個人層次和群體層次。在個人層次上，自主性是指個別的社會行動者界定其行動、不受社會機制左右的能力。透過網際網路，個別的行動者可以與志同道合的其他個體連結，進而建構群體的自主性文化。最顯著的網際網路活動是透過社群網站進行，它刺激分享文化的發展。

（二）網路潛水者：隱匿與旁觀

美國在 1995 年建立公共使用的網際網路，很快地，網路潛水現象便引起學者們的注意與研究。^[8] 李明穎以 2008 年的野草莓運動為研究案例，探討網路潛水者的公民參與。文中指出過去對網路潛水者的界定大致可區分為兩種方式。其中之一是以發言程度來看，大致上是指「在網路上瀏覽但不發言或極少發言的人」。另一種界定方式則是從

網路社群參與來看，是指「處於周邊觀察位置，以隱匿的方式參與網路社群」（李明穎，2012：82-83）。針對野草莓運動案例性質，李明穎對網路潛水者的界定則是「以積極／消極、主動／被動的『相對』參與概念，將參與社會運動的網路潛水者定位為網路旁觀者，對比積極參與的行動者」（同上引：89）。

李明穎對野草莓運動的網路潛水者所做的深度訪談結果，發現潛水者在資訊來源方面，野草莓的官方部落格並沒有成為潛水者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他們大多「任意瀏覽散布在網路各處的野草莓運動相關資訊。」「即使潛水者會在網路蒐尋資訊，目前他們獲取社會運動的相關資訊仍以大眾媒體做為主要消息來源」（李明穎，2012：94）。

在網路直播的評價方面，潛水者不認為網路直播會增加參與人數。對於網路直播現場同時開放討論，潛水者大多只想當觀眾。李明穎指出：

對於潛水者而言，網路直播只是單向式傳遞現場已經做好的決策，而且訊息趨向零碎化，不只未能符合他們的參與需求，無法形成遠距／現場、線上／線下參與者的公共對話，只成為少數行動者相互取暖、相互慰藉的注視空間。（同上引：107）

在網路動員與人際關係方面，潛水者以旁觀的方式隱匿在網路空間，也隱匿在網路促成的社會運動空間。他們以近似快閃行動的心態參加現場活動，但也維持「不現身參與」的自由。潛水的受訪者直言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弱，網路不適合行動動員（李明穎，2012：103）。究其原因，潛水者拒絕被歸屬於特定群體，也不願意因為現身而被貼標籤。

李明穎的研究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運動網路潛水者隱匿與旁觀的特性、參與／不參與的流動性，都呼應了 Castells 討論的網路時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自主性與個體性特質。但台灣網路潛水者的行為有其在地脈絡，不願被貼政治上的藍綠標籤是重要因素。

（三）電子符號行動者：能動性與學習者

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行動者主體性該如何考察？黃鈴媚、沈錦惠與曹開明（2014）以「電子符號行動者」（electronic symbolic actors）這個概念探討網路傳播社會中的閱聽人主體性。文中主張電子符號行動者具有以下屬性：

一，大家都是參與者（involved participants）：所有的行動者都是參與者，說寫閱聽皆行動，只是涉入程度不同。沒有固定的傳方和受方之分，也無觀察者和行動者之別；因為觀察（閱、聽）就是一種行動。二，個人價值決定角色（value-based role-playing）：基於價值排序的差異，行動者彼此間互為我／我們、他／他們四種角色；此時行動者角色呈現靜態特質。三，大家都是學習者（reflexive actors）：基於行動者的「反思性」，行動者即是學習者。在事件生成變化過程中，因其「反思性」而產生角色的變化；此時行動者角色呈現動態、有機的（能成長、能變化）特質。（黃鈴媚等，2014：116）

從這些屬性來看，電子符號行動者的行動方式和範疇是相當寬廣的。即使是網路潛水者或網路圍觀者也都是行動者，因為觀看或閱讀本身都是行動。此外，電子符號行動者也沒有所謂線上線下之分，因為線上線下都是電子符號行動者的生活場景。電子符號行動者可能在實體空間現身抗議，也可能在網路空間觀看、留言、參與聯署等。

黃鈴媚等（2014）指出電子符號行動者的學習者特性，也回應了前面討論的社運行動者流動的、能動的特性。行動者隨著事件的發展與各種訊息的接觸，在反思與學習的過程中，對事件、對自己、對群體的看法也在逐漸發展或改變。該研究以「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為研究對象，發現行動者互為我、我們、他、他們四種行動角色，這些行動角色呈現動態的特質。

綜合以上討論，接下來的問題是：網路時代行動者特性與社運四圈行動者會交織成什麼樣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1. 從行動者的個體性、自主性、能動性、學習者等特質，我們可以預期社運行動者在社運四圈之間的高度流動性。
2. 社運行動者的隱匿、旁觀、潛水的特質主要屬於第三圈與第四圈的社運行動者特質，在第四圈行動者尤其彰顯這些特質。
3. 社會運動行動召喚下瞬間匯聚又瞬間散去的人潮正是反映網路潛水的、自主的眾多行動者特性。

至此，本文提出以四圈的行動者來描繪網路時代的社運行動者，並討論網路時代行動者特質。接下來，本文將從社會運動語藝特性與社會運動說服功能的討論，對應四圈行動者特性的語藝選擇。

參、社會運動語藝特性與說服功能

早在 1950 年代語藝學者如 Griffin (1952) 便已討論社會運動的說服面向。隨著社會運動現象的普遍，1970 年代可說是社會運動語藝研究顯著成長的年代，重要著作如 Bowers & Ochs (1971)、Simons (1970)、Simons (1972) 等。1980 年代以後社運語藝研究蓬勃發展，相關著述出版倍增，社會運動語藝研究已經成為語藝學者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在台灣，社會學者對社會運動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的研究論著。許維德 (2011) 對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歷史考察，呈現社會學界對社運研究的高度投入。相較之下，從語藝觀點探討社會運動的說服面向的研究則相當有限，但在 2000 年之後也陸續產生相關研究論著與學位論文。^[9] 限於期刊篇幅以及考量本文論述主軸的銜接，在此選擇與本文論述焦點相關的社會運動語藝概念加以討論。

本文在第貳部分已討論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為了規劃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與其對應的語藝選擇的理論藍圖，在此必須先討論社會運動語藝的相關概念，以銜接行動者與語藝行動關係的探討。以下從說服性語藝與強制性語藝的區分、社會運動語藝的特性與弔詭、社會運動的說服功能等三個面向來進行討論。

一、說服性語藝與強制性語藝

自古典時期以來「說服」便是語藝的核心概念，但學者們對於說服的界定則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當代以來，語藝學者對說服的界定趨向廣義的界定，代表人物如 Kenneth Burke，在他的論述中，說服（persuasion）、認同（identification）、實質共享（consubstantiality）幾乎是同義詞。對 Burke 而言，只要有意義，就有說服（Burke, 1966, 1969）。在這樣的廣義界定下，所有溝通行為都有說服面向，所有的溝通行為都可視為語藝行為。

當 20 世紀的社會運動現象引起語藝學者的關注，社會運動語藝所進行的說服行動應如何考察與區分，再次引發學者們對所謂「說服」的界定和討論。社會運動起於對現狀的不滿、要求改變現狀，毋庸置疑的是，「說服」是社會運動的必要任務。但是社會運動的說服，有不同的展現方式，語藝學者對於如何區分和評估不同的說服表現，衍生出說服性語藝（persuasive rhetoric）和強制性語藝（coercive rhetoric）的討論。

Griffin（1964: 127）認為語藝行動具有強制性而不是說服性的主要區分在於強制性的行動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他依舊把強制性的行動視為語藝行動的一環，但他認為強制性的語藝是非理性的語藝。

Simon（1951: 109）認為強制是迫使一個人趨向違反個人意願的行為。相較之下，「說服是一個道德的過程。說服是喚醒一個人自願地趨向某一個特定的行動。強制與自由選擇衝突，而說服則意味自由選擇。」Simon 從自由選擇（free choice）的角度區分說服與強制，並強調說服才是道德的行為。

Andrews（1969）回應 Simon 的觀點，雖然同意依據自由選擇區分說服與強制，但他認為完全的自由選擇是不可能的。他把兩極化的區分調整為程度的差別。他認為強制的語藝和說服的語藝之間是一個程度問題。他認為在溝通過程中，接收者被限制選擇範圍的程度決定語藝的說服程度和強制程度。社會運動進行說服，期望目標對象採取行動，並讓接收者有不同行動選擇的空間。選擇空間大，表示說服性較強；選擇空間小，表示強制性較強。

Andrews 對於強制性的語藝不以為然。他以 1968 年學生占領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活動為例，認為抗爭者採取強制的語藝而不是說服的語藝，抗爭者的語藝只提供唯一的行動路徑，沒有其他選擇、沒有協商空間（Andrews, 1969: 11-13）。

當多數的學者對於強制性的語藝不以為然，Simons（1972）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學界有傾向既存機制的偏見（establishment bias），預設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不會用強制力，暴民會用強制力。這樣的預設導致對社會運動語藝的「說服和強制」產生有問題的區分與評價。他認為語藝學者太堅持「說服與強制」二分的概念。純粹說服的個案或許存在，但純粹強制的個案則不可能，因為在強制的情況下仍涉及說服面向。他提出另一個概念，即「強制性的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他認為強制性說服才是更普遍的現象（Simons, 1972: 231-232）。

許多語藝學者錯誤地預設社會衝突就是意見不同，Simons 則認為要區分社會爭議（controversy）和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s）。社會爭議來自意見不同，可以溝通協商解決問題。社會衝突則是來自對有限的地位、權力、與資源的價值與宣稱的爭奪，反對者意圖中立化、傷害或消除對手。在社會衝突的情況下，無法只以溝通解決，因為雙方可能存在無法取得共識的差異（Simons, 1972: 230-231）。也因此，Simons 對於社會運動採取強制性的語藝抱持理解的態度。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多數學者認為說服和強制是不一樣的語藝行為，但是對於區分方式有不同看法。Griffin 從理性與非理性的角度區分，Simon 從是否提供自由選擇的角度區分，Andrews 雖同意從自由選擇的角度區分，但認為說服和強制不是二分的概念，而是程度問題。前述學者對於強制性語藝抱持負面評價，而 Simons 則是認為強制語藝在無法協商的社會衝突前況下是無可避免的語藝策略。但是 Simons 並未討論強制性的語藝到什麼樣的程度可以被接受，到什麼樣的程度無法被接受。例如，激烈衝突的行動如果造成實質破壞，到什麼樣的程度可被諒解？到什麼樣的程度就難以被認可？

本文立場傾向於從自由選擇的角度區分社會運動語藝的說服性與強制性，並認為說服性與強制性是程度上的區分。本文雖然也同意在

難以協商的社會衝突情境下，強制性語藝有其作用，但主張強制性語藝的運用仍應以象徵性破壞為原則。象徵性（symbolic）是語藝行動的範疇和界線。超過象徵性的界線，就不是語藝行動。這就是丟雞蛋和丟炸彈的差別。

二、社會運動語藝的特性與弔詭

對抗與連結、排除與涵括是兩組社會運動語藝的特性，這兩組特性必然存在，卻又分別存在互相拉扯的弔詭。

（一）對抗與連結

社會運動起於挑戰現狀，對抗或衝突的語藝無可避免。Robert Cathcart 在 1978 年的文章提出對抗（confrontation）是社會運動語藝特有的形式。他在 1980 年的文章再次申論界定社會運動必須從它的語藝形式著手，這個語藝形式便是「對抗的語藝」（confrontational rhetoric）。^[10] 對抗的語藝挑戰既存價值、信仰、或意識形態。對抗的語藝會引出對立語藝（counter-rhetoric），也就是不同於社運主張的語藝。當一個議題引發社會不同觀點的論述時，便產生所謂的辯證參與（dialectical enjoiment）。「當尋求改變者的語言策略與既存機制的語言策略產生撞擊，因而使人們認知某一群體是在既存體制外尋求改變，社運於焉誕生」（Cathcart, 1980: 269）。

對抗是社會運動的必要形式，也是區分社會運動語藝不同於其他論述情境下的語藝形式的關鍵。但社會運動同時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以壯大聲勢，因此建立連結關係的語藝也是社會運動必須耕耘之處。Stewart et al.（2012）區分對抗策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與連結策略（coactive strategies），Stewart et al. 認為兩者必須並用才能建立社會運動的正當性。

對抗的語藝可能採取的策略像非暴力抗爭與市民不服從（如罷工、遊行、靜坐、占領等）、語言嘲諷或質疑、激烈抗爭策略（如暴動、語言暴力、攻擊財產或侮辱警察）。連結的語藝可能採取的策略像是訴諸傳統、訴諸普世價值、建立與既存被認可的組織（或群體或人物）的關聯性、超越策略。

（二）排除與涵括

對抗與連結的語藝涉及價值、信仰、意識形態、傳統等訴求。排除與對抗的語藝則涉及目標對象的選擇。這兩組概念有所區分，但也息息相關。

社運語藝中的對抗語藝透露其挑戰的對象，也就是他群；連結的語藝則透露我群。他群和我群分別是語藝排除（exclusion）和語藝涵括（inclusion）的對象。在黃鈴媚等（2014）的研究中，將「電子符號行動者」彼此間互為我／我們、他／他們四種角色。其研究發現在針對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的分析中，常出現的角色為「我們」和「他」。也就是說，我群以複數呈現居多，他群以單數的他居多。這樣的研究發現透露有趣的訊息。這個案例的社運行動者以複數的「我們」呈現我群的聲勢，但對於要挑戰或排除的對象則把範圍縮小為單數的「他」。

社運語藝的「對抗與連結」、「排除與涵括」分別成為一體兩面、彼此不可或缺的語藝特性。社會運動中對抗的必要性同時彰顯連結的必要性；排除的必要性同時彰顯涵括的必要性。這樣的語藝特性產生語藝弔詭。過度的對抗可能傷害連結，過度的連結可能削弱對抗。過度的排除可能傷害涵括性（支持者數量萎縮），過度的涵括可能難以凸顯「敵人」的威脅。

以 2010 年白玫瑰運動、2013 年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所號召的萬人送仲丘、2014 年太陽花運動為例，大致都以非暴力抗爭或公民不服從的方式進行對抗，採取訴諸正義或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連結策略，這樣的對抗和連結有助於行動召喚。但是，在社運進行過程中，有些策略也可能引起質疑，像是太陽花運動召喚民眾包圍台灣各地的國民黨服務處，表達對服貿協議的抗議。這樣的策略把國民黨整體當作排除對象，也就是視國民黨整體為他群。範圍過大的排除策略可能把部分原本支持反黑箱服貿訴求的人推開。

三、社會運動的說服功能

Stewart et al. (2012: 49-88) 在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歸納社會運動的六個主要說服功能，合理描繪語藝在社會運動歷程的作

用，以下初步解釋這六個功能，再討論網路在這六個功能的發揮有何差別。

（一）改變對真實的認知

社會運動語藝企圖改變人們對真實的認知，包括改變人們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認知。改變人們對過去或現狀的認知，用意在於指出改變的必要性。改變人們對未來的認知則是描述採取行動可獲致希望的未來，藉此強化行動的迫切性。

（二）增強抗爭者對自我的認知

抗爭者必須有強大且健康的自我（strong and healthy egos）才能推動社運的持續。社會運動的語藝必須推動自我增強功能以應對延長的社會抗爭。自我增強功能的語藝要區分兩種不同的社運性質，包括自我導向的社運以及他者導向的社運（如前述）。自我導向的社運語藝以創造新的自我價值或新的認同為主，他者導向的社運語藝以強化既存的自我價值為主。

（三）合理化社會運動

合理化社會運動也就是建立社會運動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是社運語藝的關鍵任務。首先必須瞭解既存機制所享有的權力與正當性。社運在建立正當性時主要可採取連結策略與對抗策略，兩者須並用才能成功。

（四）規劃行動方向

社會運動語藝必須達成規劃行動方向的說服功能，其作用在於推銷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包括指出要做什麼、誰必須做、如何做。

（五）行動動員

社會運動在規劃特定抗爭活動時，必須發揮動員力量，以展現社會運動被民意支持的聲勢。

（六）維繫社會運動

當社會運動目標需要長期努力才能達成，維繫社會運動的能量便成為重要的說服功能，包括解釋社會運動目標的延遲、維持運動的動能、維持社會運動的能見度等。

在這六個社會運動說服功能中，網路在行動動員所發揮的作用受到較多的注意和肯定，但是在後續的維繫社會運動上，網路效益則受到考驗。對此，王維菁等（2013：11-13）的研究提供了相關的印證。他們對台灣八家環保團體的網路社會運動經驗所做的深度訪談，發現網路動員的限制包括：一，偏向單向傳播、缺乏互動；二，對網路群眾缺乏瞭解、無法有效經營網路社群；三，易成封閉體系、無法擴大影響力；四，網路動員效果無法累積。

在瞭解社會運動語藝特性與說服功能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社運行動者，可對適用的溝通平台進行初步規劃，本文在下面的討論提供這個規劃。

肆、網路時代的社運行動者與語藝選擇

考量網路時代四圈社運行動者的特性與差異，本文進一步建議與四圈行動者對應的語藝選擇以及媒介平台的考量。在語藝選擇的部分，從三方面討論：認同召喚、社運說服功能、與擴展第四圈行動者的語藝原則。

一、認同召喚的語藝選擇

前述四圈社運行動者的區分，可用來進一步思考他們被召喚的主要動力以及媒介平台。第一圈和第二圈的行動者屬於組織成員，其動力來自對組織的認同，是組織動員較能著力的對象。這兩圈的行動者應以人際溝通和社群媒介為主要溝通平台。第三圈以議題認同為主，未必加入特定組織或對組織的忠誠度不高，這種人被召喚的主要動力是議題認同。第四圈的行動者缺乏對特定議題的持續關注，被召喚的主要動力可能來自行動本身。由於第三圈與第四圈的行動者對組織認同度低，適當的媒介平台為網路連結以及傳統的大眾媒介。表 2 彙整這四圈行動者、認同召喚、媒介平台運用的重點。

表 2：四圈社運行動者、認同召喚、與媒介平台

社運行動者	認同召喚	媒介平台
第一圈	組織認同	人際溝通，社群網站
第二圈	組織認同	人際溝通，社群網站
第三圈	議題認同	網路連結，傳統媒介
第四圈	行動認同	網路連結，傳統媒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為長期的社會運動經營提出兩個主張。第一，議題的持續經營與論述比行動召喚重要。第四圈行動者是社運擴大支持聲勢最大的來源，卻也是最難瞭解、最難預期的對象。此時此地的行動參與，並不意味後續的持續參與。網路潛水者大多在第四圈游離，有潛力向內圈移動、但也可能維持隱匿與旁觀。對於長期的社會運動而言，議題的經營與論述比行動召喚更為重要。社會運動推動者在論述上如果無法提供對相關議題的充分闡釋，就無法為後續行動提供正當性。

李明穎對網路潛水者的研究提供相關的看法，他認為「儘管網路是社會行動者可供運用的新式資源，他們卻誇大工具理性，而忽略潛水者對運動理念的疏離感。」這個觀點透露社會運動理念經營的重要性。李明穎進一步指陳「我群化的集體認同並不是單純依恃網路技術就足以克服，而是應回歸到運動本身能否開展更加完整全面的論述」（李明穎，2012：107）。

第二，社會運動須同時借助傳統大眾媒介與網路平台才能維繫不同的支持者。Tilly & Wood（2009: 85）認為新媒體（如網路）的重要效果不在於形塑不同的社運形象，而是在於連結行動者與特定對象，但這樣的連結也意味與其他對象的斷鏈（disconnect）。因此，社會運動推動者經營網路平台有助於鞏固既有的支持者如第一圈和第二圈行動者，但也必須同時借助傳統的大眾媒介平台，讓游離的支持者如第三圈和高度自主的第四圈行動者保持被告知（informed）的狀態，以免產生斷鏈的情況。

二、社運說服功能與目標對象的語藝選擇

Stewart et al.（2012）對於社會運動說服功能的討論並未直接區分訴求對象的差別。雖然在討論個別說服功能時，訴求對象隱然呈現，

表 3：社運說服功能、目標對象、與媒介平台

社會運動的說服功能	目標社運行動者	媒介平台
改變對真實的認知	第三、第四圈	網路連結，傳統媒介
增強抗爭者對自我的認知	第一、第二圈	人際溝通，社群網站
合理化社會運動	第三、第四圈	網路連結，傳統媒介
規劃行動方向	第一、第二圈	人際溝通，社群網站
行動動員	全部四圈	網路連結，傳統媒介
維繫社會運動	第一、第二圈	人際溝通，社群網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 Stewart et al. 尚未清楚勾勒這些說服功能在面對不同對象時的區分。本文接續先前對社運行動者第一圈到第四圈的區分，試圖把社運說服功能、目標對象、媒介平台的關係彙整成一個參考架構（見表 3）。

首先，第一圈與第二圈（內部閱聽眾）是長期經營的社會運動主要溝通對象，尤其以改變抗爭者對自我的認知、規劃行動方向、行動動員、維繫社會運動為主要的溝通與說服功能。對於社運的第三圈第四圈（外部閱聽眾），改變對真實的認知和合理化社會運動是主要的說服／溝通功能。

其次，在社運說服功能與目標對象的考量下，主要的媒介平台應有所區隔。針對第一圈與第二圈的行動者，人際溝通與社群網站可做為主要溝通平台。針對第三圈與第四圈的行動者，經由網路連結（包含社群網站）提供社運主張與論述，同時要讓社運主張經由傳統大眾媒介向外擴散。

最後，在不同的社會氛圍、不同的社會運動階段，社會運動需要進行的說服功能與目標對象也需要視情境調整。例如，對於已經認同社運團體或社運主張的第一圈與第二圈，合理化社會運動的語藝毋需著力。但是當社會運動變成經年累月的努力，社運目標和策略的調整，意味合理化社運的訴求重新開啟，此時合理化社會運動的語藝便可能兼具面對四圈行動者的挑戰。

這個社運說服功能與目標對象的區分不是絕對的區分，也不是互斥性的區分，而是一種流動的、程度性的區分。舉例而言，改變對真實的認知以第三、第四圈行動者為主要訴求對象，並不意味改變對真

實的認知對其他對象就不重要，這是一個程度的區別。對於尚未認同社運主張或社運團體的人而言，改變他們對真實的認知是社運團體重要的、立即的溝通任務。但是對於已經認同社運主張或社運團體的人（第一與第二圈行動者），這就不是關鍵溝通重點。

三、擴大第四圈的語藝原則：連結大於對抗、涵括大於排除

前述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包括像是個體性、自主性、網路潛水、隱匿、旁觀、學習、能動性等。瞭解這樣的特性，便可以瞭解在社會運動抗爭中來無影去無蹤的行動者現象。眾多的第四圈行動者反映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他們透過各種媒介平台觀察。他們在觀察中學習。他們具有來去自如的個體性和自主性。特定的行動召喚在某些時刻會促使這些人現身，但是這樣的現身未必轉化成持續的議題認同和組織認同。面對這些高異質性與高自主性的網路行動者，社運推動者如何做出適當的語藝選擇？社運語藝具有「對抗與連結」、「排除與涵括」的特性。本文主張「連結大於對抗」、「涵括大於排除」是社會運動試圖擴大第四圈支持者應採取的原則。

Bowers, Ochs, Jensen, & Schulz (2010) 認為社會運動在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後多會採取兩極化策略來明顯區分敵我，目的在強化支持者、增加支持者，於是產生「你如果不是問題解決者，就是問題製造者」的論述。在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最後演說中，便出現這樣的兩極化語言：「世界上沒有什麼人叫做社運分子，唯一有區別的，只有關心社會與不關心社會的人兩種」。（公民 1985 行動聯盟，2013.08.04）這樣的兩極化語言有助於強化現場參與者的認同，或許也有召喚不在現場但關心的人，但這種兩極化語言也可能把有些人推開。兩極化的語言表面上邀請閱聽者選擇立場，事實上，上述語言只提供一個選項：即「關心社會」。這種讓閱聽眾別無選擇的語言，是一種強制性的語藝，可能產生不同評價。

Bowers et al. (2010: 34-35) 也指出兩極化策略經常使用的技巧之一是製造旗幟議題（flag issues）和旗幟人物（flag individuals）。太陽花運動一開始以「黑箱服貿」為旗幟議題，當揮舞的議題是關於程序

正義時，涵括性最大，獲得廣大的支持。但是當旗幟議題變成「反服貿」時，涵括性變小，支持者開始有不同聲音。太陽花運動以馬英九為旗幟人物時，如果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跌到谷底，揮舞這樣的旗幟人物或許意味與民意站在一起。但是民意經常隨著新聞事件或議題起起伏伏，社運語藝必須適當選擇旗幟議題和旗幟人物。

Morris & Browne (2006: 163) 認為即使是最具理想性的社會運動還是受到現實的約束，社會運動如果要成功，必須回應外在情境與外部閱聽眾。他們主張社會運動推動者在語藝策略上，必須「兼顧那些他們想要說服的對象以及那些最可能反對的人」。依照 Morris & Browne 的見解，即使是「那些最可能反對的人」也不應被社運語藝排除。

伍、結語

在網路時代，社會運動語藝面對的是浩瀚無際、難以辨識的大眾。想像社運語藝聲嘶力竭地喊：「你在哪裡？」期待召喚「我在這裡」的回應。「我在這裡」的回應可能反映在臉書上的「讚」或網路上回應討論的頻次，也可能反映在實體空間的「現身」抗議。我們看到網路在動員上瞬間的效力，卻難以預期後續的張力。

本文認為網路時代社會運動的挑戰在於必須重新認識網路時代的「行動者」，才能採取適當的語藝選擇，包含語言符號與媒介平台的選擇。以下總結本研究對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與語藝選擇的提議：

- 一、以四圈行動者的概念區分網路時代的社運行動者，區分的依據包括時間付出程度、組織參與／認同程度、議題關注程度、行動參與程度與參與方式。以第一圈為內圈，依序向外圈擴散。內圈承諾度最高，依序向外遞減。
- 二、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特性包括個體性、自主性、隱匿、旁觀、能動性、反思性（學習）等，這些特性在第四圈行動者身上尤其顯著。
- 三、社運推動者針對四圈行動者差異，應採取不同的認同召喚與媒介平台的選擇。第一圈與第二圈以組織認同的語藝為主，借助人際溝通與社群網站，第三圈與第四圈則分別為議題認同與行動認同，

借助網路連結與傳統媒介。長遠來看，讓第四圈移向第三圈的重點在於以持續的議題論述召喚行動者的認同。

四、社會運動的六個說服功能各有其主要的目標對象的選擇。增強抗爭者對自我的認知、規劃行動方向、維繫社會運動這三個說服功能主要是針對第一與第二圈行動者。改變對真實的認知與合理化社會運動這兩個說服功能主要是針對第三與第四圈行動者。行動動員的說服功能則是針對所有四圈行動者。

五、第四圈行動者彰顯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特性，其龐大潛力與難以預期是社運推動者必須面對的挑戰。本文建議擴大第四圈支持者的語藝原則為「連結大於對抗」、「涵括大於排除」。

走筆至此，本文所勾勒的四圈行動者圖像以及對應的語藝選擇，似乎主要為社會運動推動者／行動者提供參考架構。確實如此。這個架構提供實踐意義。另一方面，這個架構也意圖提供學者和公民觀察社會運動的參考依據。本文所強調的行動者角度與語藝角度，使網路時代社會運動的考察從結構因素轉向「人」的因素。在網路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第一圈的社運推動者，召喚著：「你在哪裡？」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第四圈行動者，以不同的分貝和方式回應：「我在這裡！」

註釋

- [1] 請見〈議場冷清 林飛帆：欸排班呢〉（2014.04.01）。《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4年4月1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401/35738003/>
- [2] 關於社會運動語藝的外部閱聽眾（external audience）的研究論述請見 Andrews（1969）、Browne（1994）、Campbell（1973）、DeLuca & Peeples（2002）、Hyde & Rufo（2000）、Olson & Goodnight（1994）、Pezzullo（2003）。
- [3] 關於社會運動語藝的內部閱聽眾（internal audience）的研究論述請見 Dow（1994）、Hammerback & Jensen（1994）、Hogan & Williams（2000）、Lake（1983）、Tonn（1996）。

- [4] 請參考「快樂・樂生 | 青年樂生聯盟」網站 <http://happylosheng.blogspot.tw/>
- [5] 請見〈出關播種 太陽花學運學生退場聲明全文〉。《自由時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4年4月7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83576>
- [6] 關於在立法院二樓守護的太陽花運動成員的聲明，請見劉康彥（2014.04.10）。〈不爽帆廷退場「奴工」二樓爬窗怒撒聲明〉，《ETtoday》。上網日期：2014年4月10日，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410/345050.htm#ixzz2yajZsxLz>
- [7] 太陽花運動部份學生離開立法院，在立法院外面另闢賤民專區，請參考〈23 學生出走 闖賤民區 反對菁英領導 學運不回應〉（2014.04.03）。《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4年04月03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403/35743128/>；關於賤民解放區成員對於退場的意見請參考〈賤民割爛尾宣言〉（2014.04.09）。《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上網日期：2014年4月9日，取自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17434/comment-page-1>
- [8] 網路潛水者的相關討論請見 Burnett (2000)、Correll (1995)、Katz (1998)、Nonnecke & Preece (2000)、Nonnecke, Andrews, & Preece (2006)、Lindlof & Shatzer (1998)、Preece, Nonnecke, & Andrews (2004)、von Krogh, Spaeth, & Lakhani (2003)。中文相關研究如李明穎 (2012)、李郁薇 (2005)、黃兆麒 (2009)。
- [9] 林靜伶 2000 年及 2001 年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應該是國科會最早的社會運動語藝研究計畫。在台灣從語藝觀點進行的社會運動學位論文，大致出現在 2000 年之後，如朱安棋 (2009)、邱雍閔 (2006)、陳雅惠 (2001)、謝文華 (2002)。以期刊或專書論文出版的社會運動語藝相關研究如王孝勇 (2006)、林靜伶 (2007, 2009)、趙雅麗 (2001)、蔡鴻濱 (2006)。
- [10] 將社會運動語藝的本質視為「對抗」(confrontation) 的其他相關文獻請見 Andrews (1969)、Cathcart (1978)、Cox (1982)、Griffin (1964)、Scott & Smith (1969)、Sillars (1980)。

參考書目

-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2013.07.21)。〈720 謝幕演說〉。上網日期：2014 年 7 月 14 日，取自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ttcitizen1985/news/720xiemuyanshuo>
-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2013.07.27)。〈要真相！要人權！8/3 凱道萬人送仲丘！！〉。上網日期：2014 年 7 月 14 日，取自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ttcitizen1985/news/yaozhenxiangyaorenquan83kaidowanrensongzhongqiu>
-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2013.08.04)。〈2013/08/03 公民聯盟公民覺醒最後演說（錄影與逐字稿）〉。上網日期：2014 年 7 月 14 日，取自 <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2013/08/803.html>
- 王孝勇 (2006)。〈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理論的論辯與意義〉，《傳播與管理研究》，5 (2)：131-162。
- 王甫昌 (2003)。〈社會運動〉，王振寰、瞿海源 (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502-536。台北市：巨流。
- 王維菁、馬綺韓、陳釗偉 (2013)。〈網際網路的社會運動：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資訊社會研究》，25：1-22。
- 朱安棋 (2009)。《社會運動中的部落格語藝——以蘇花糕餅舖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明修、林秀幸 (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台北市：群學。
- 李明穎 (2012)。〈網路潛水者的公民參與實踐之探索：以「野草莓運動」為例〉，《新聞學研究》，112：77-116。
- 李郁薇 (2005)。《網路潛水社群中的潛水現象：一種被忽略的充分參與》。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靜伶 (2000)。《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理論與本土實踐的初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89-2412-H-030-010)。新北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
- 林靜伶 (2001)。《社會運動的正當性論述：連結與對抗的語藝策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0-2412-H-030-003)。新北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

- 林靜伶 (2007)。〈社會運動中菁英論述的抗衡〉，曹虹 (編)《當代媒體生態問題探討論文選》，頁 24-33。香港：珠海學院。
- 林靜伶 (2009)。〈初探網路連署的行動力與說服力〉，柯達群 (編)《數位傳播語境下的兩岸三地新聞文化探討論文選集》，頁 68-78。香港：珠海學院。
- 邱雍閔 (2006)。《美濃反水庫運動之語藝歷程 (1992-2000 年)》。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茂桂 (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33-66。
- 許維德 (2011)。〈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歷史考察〉，何明修、林秀幸 (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頁 449-519。台北市：群學。
- 陳雅惠 (2001)。《運動刊物中性別論述的演變——婦女新知的語藝觀察》。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兆麒 (2009)。《從社會比較觀點探討虛擬社群的瀏覽行為》。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 黃鈴媚、沈錦惠、曹開明 (2014)。〈網路傳播社會中的電子符號行動者：從台灣國光石化案重構閱聽人之主體性〉，《傳播與社會學刊》，27：101-148。
- 趙雅麗 (2001)。〈民進黨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新聞學研究》，68：151-192。
- 蔡鴻濱 (2006)。〈網路社會運動之語藝分析：以苦勞網中香港反 WTO 事件為例〉，《傳播與管理研究》，6 (1)：1-48。
- 謝文華 (2002)。《客家母語運動的語藝歷程 (1987-2001)》。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Andrews, J. R. (1969). Confrontation at Columbia: A case study in coercive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5(1), 9-16.
- Bowers, J. W., & Ochs, D. J. (1971). *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owers, J. W., Ochs, D. J., Jensen, R. J., & Schulz, D. P. (2010). *The rhetoric of agitation and control* (3rd ed.).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Browne, S. (1994). "Like gory spectre": Representing evil in Theodore Weld's *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0, 277-292.
- Burke, K. (1966).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nett, G. (2000).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 typology. *Information Research*, 5(4). Retrieved June 24, 2008, from <http://informationr.net/ir/5-4/paper82.html>
- Campbell, K. K. (1973). The rhetoric of women's liberation: An oxymor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9, 74-86.
-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Cathcart, R. S. (1978). Movements: Confrontation as rhetorical form.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43, 233-247.
- Cathcart, R. S. (1980). Defining social movements by their rhetorical form. *The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1, 267-273.
- Correll, S.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The lesbian caf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270-298.
- Cox, J. R. (1982). The die is cast: Topical and ont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locus of the irreparabl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8, 227-239.
- DeLuca, K. M., & Peebles, J. (2002). From public sphere to public screen: Democracy, activism, and the 'violence' of Seattl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 125-151.
- Dow, B. J. (1994). AIDS, 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 and gay identity in Larry Kramer's '1,112 and Count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45, 225-240.
- Griffin, L. M. (1952). The rhetoric of historic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8, 184-188.
- Griffin, L. M. (1964).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the new left movement: Part I.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0, 113-135.

- Hammerback, J. C., & Jensen, R. J. (1994). Ethnic heritage as rhetorical legacy: The plan of Delan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0, 53-70.
- Hogan, J. M., & Williams, G. (2000). Republican charism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textual persona of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6, 1-18.
- Hyde, M. J., & Rufo, K. (2000). The call of conscience, rhetorical interruptions, and the euthanasia controversy.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 1-23.
- Katz, J. (1998). *Luring the lurkers*. Retrieved June 14, 2009, from <http://slashdot.org/features/98/12/28/1745252.shtml>
- Lake, R. A. (1983). Enacting Red Power: The consummatory function in Native American protest rhetoric.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9, 127-142.
- Lindlof, T. R., & Shatzer, M. J. (1998). Media ethnography in virtual space: Strategies,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2, 170-189.
- Morris, C. E., & Browne, S. H. (Eds.). (2006). *Readings on the rhetoric of social protest* (2nd ed.). State College, PA: Strata.
- Nonnecke, B., Andrews, D., & Preece, J. (2006). Non-public and public onlin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ed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6, 7-20.
- Nonnecke, B., & Preece, J. (2000). Lurker demographics: Counting the silent. *Proceedings of CHI 2000*, 73-80.
- Olson, K. M., & Goodnight, G. T. (1994). Entanglements of consumption, cruelty, privacy, and fashion: The social controversy over fur.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0, 249-276.
- Pezzullo, P. C. (2003). Resisting 'national breast cancer awareness month': The rhetoric of counterpublics and their cultural performa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9, 345-365.
- Preece, J., Nonnecke, B., & Andrews, D. (2004). The top five reasons for lurking: Improving community experiences for everyon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 201-223.

- Scott, R. L., & Smith, D. K. (1969). The rhetoric of confront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5, 1-8.
- Sillars, M. O. (1980). Defining movements rhetorically: Casting the widest net.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46, 17-32.
- Simon, Y. R. M. (1951). *Philosophy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mons, H. W. (1970). 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A theory of persuasion for soci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6, 1-11.
- Simons, H. W. (1972). Persuasion in social conflicts: A critique of prevailing conceptions and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Speech Monographs*, 39, 227-247.
- Stewart, C. J., Smith, C. A., & Denton, R.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Tilly, C., & Wood, L. J. (2009).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8*. Boulder, CO: Paradigm.
- Tonn, M. B. (1996). Militant motherhood: Labor's Mary Harris 'mother' Jone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2, 1-21.
- von Krogh, G., Spaeth, S., & Lakhani, K. L. (2003). Community, joining, and specialization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Research Policy*, 32, 1217-1241.
- Wilson, J. (1969).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Social Movement Actors and Rhetorical Choices in the Internet Age

Jing-Ling Lin*

Abstract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n achieve maximum mobilization effect in a short time, which may, however, soon evaporate.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landscape,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needs to re-conceptualize actors and to examine corresponding rhetorical strategies.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social movement cases,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rings of actors, extending from actors with the highest commitment in the center to actors on the periphery.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actors of the fourth ring (i.e., those occupying the outlying ring)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utonomy, individuation, anonymity, and lurking behaviors; they most epitomize the nature of social movement actors in the Internet age. This paper proceeds to propose rhetorical choices and media use catering to actors of the four rings.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 actors, persuasive functions of social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rhetoric, rhetorical choices, Internet age

*Jing-Ling Lin is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airiti 
press.®